

清代广东人在上海

冯尔康

冯尔康，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，历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、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。主要著作有《雍正传》《中国社会史概论》《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》等。

上海历史地位的变化与移民，尤其是与广东人有重大的关系。

上海在清朝前期就是一个交通商业重镇，《江宁条约》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，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发展迅速，洋务运动后，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。徐润在1883年说：“上海自泰西互市，百业振兴，万商咸集，富庶甲于东南”。岂只富甲东南，孙世馥在《徐愚斋自叙年谱序》中说“上海为中外总枢”。清末上海商业之兴盛为全国之冠，“实为中外贸易之中枢”。在政治上上海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留恋于此，所谓“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，名流硕彦，接迹来游”。维新运动主将康有为甚至有迁都上海的设想。在行政上上海虽然只是苏松太道的驻地，但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政治中心。清代，主要是近代，上海地位变化巨大，发展迅猛。

上海的兴盛，除了土著居民的贡献，移民发挥了重大作用。它是一个移民城市，新的居民来自江苏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、安徽等省。如果我们把清代上海的发展，比作一个演员的演出，他学艺时的教师、演出中的导演、化妆师，都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，外省迁民与土著共同建设

了上海，广东人也是上海建设的导演之一。

广东人究竟如何在上海发挥作用，以及起了什么作用呢？

一、粤人向沪移徙及其群体

广东沿海居民，富有冒险精神，在清代，国内至各省，海外往南洋、美洲，多从事商业和做工，像潮州“舶艚船，则运达各省，虽盗贼、风波不惧也”。

粤民到上海，在清前期就不乏其人。乾隆中周硕勋主修的《潮州府志》，说到该府“妇女妆束，以航海往来苏松间，相仿者多”。这是说潮人经海道到上海，进入松江府，再到苏州。既然形成女子学习苏松人化妆的习惯，可见往来苏松的人不在少数。随着清代经济发展和粤人经商的敏感，在上海开埠之后，即意识到它是“南北仕商往来孔道，交易有无之路通，为生可以致富”。遂热衷于到上海做买卖，所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粤人激增，以后陆续增加，绝对数量很大，在上海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
上海开埠，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商人纷纷到来，原在广州贸易的转向上海，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，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，有的还走在西方人前头。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、通事、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，甚至于达到三分之二的惊人比重。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，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，易地而来。

广东人到沪，因家族、宗族、邻里关系，互相牵引，像滚雪球一样，人数越来越多。有名的买办、官僚商人徐润、唐廷枢、郑观应家族就是显例。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；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，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；徐润从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；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，出席的有其堂弟宸臣、笏臣、赞臣、枚臣、揆臣及玉生、小勤、述斋等人，可知其家族在沪人口之众。香山唐廷枢、廷植、杰臣、纪常、廷庚、国泰均在沪营生。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。广东人到上海之多，在王韬的小说中都有了反映，《淞隐漫录》写蓟素秋是孤儿，跟随姑母生活，其姑母是粤商的妾，该商安家在上海，经常到汉口买茶，及

至“赭寇南下”（当指太平军到江南），粤商携带他们返回广东。这个故事可谓粤人在沪寄居经商事实的艺术再现。

在清末二十五年中，租界内的外省人口比上海本籍人口多得多，土籍不足1/5，粤人又在客民中占多数地位，所以在租界的整个华民中也占较大比例。总之，粤人移民上海，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构成成分。

移居上海的广东人，为了维护共同利益，建立了同乡团体。

团体建立，形成粤帮势力，与本地人及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人的帮派构成不同的派系。广东人组织的势力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广东人移民上海的兴盛和拥有巨大的势力。

二、粤人在经济领域的活动和势力

清代粤人在沪，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，中英鸦片战争以后，大量贩卖鸦片，并从事买办活动；洋务运动兴起，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，兴办新式企业，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；在清代最后五十年中华人出国做工、经商骤增，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。

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，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著《广东新语》中说：“广州望郡，人多务贾与时逐，以香、糖、果、箱、铁器、藤、腊、香椒、苏木、蒲葵诸货，北走豫章、吴、浙，西北走长沙、汉口。”广东人经商到上海，明代已经兴起，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，“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，乾隆以后兴旺起来”。杨光辅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：“湘南好，锁钥仰雄关，商货万槁通岭表……”“湘南好，市价日高低，海舸贩来红木段。洋行收去白花衣，民瘦客商肥”。嘉庆间，褚华在《木棉谱》中写到：“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，秋则不买布，而买花衣以归，皆装布囊累累，盖彼中自能纺织也。”广东到上海的商船，称为“估船”。一个月能往返一趟。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，以砂糖为大宗。红木、香料、染料（苏木）亦复不少，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，其次是陶瓷、茶叶。上海商人用“沙船”把本地棉花、布匹运往广东。

广东人随洋人到沪的，做掮客、通事，发展为买办。

清代后期上海经济界大家盛宣怀、唐廷枢、徐润、郑观应、杨坊、

严信厚、祝大椿，其属于粤籍的，都是买办出身，在给洋行经营丝茶之时，积累了经验和资本，于是自行从事这方面的经营。广东籍商人在沪经营丝、棉、茶，到这些商品的产地收购，运输到上海，转售给外国商人，行销海外。丝、茶、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，广东人在沪经营对外贸易，地位重要。

随着洋务运动兴起，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，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。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：上海轮船招商局、上海机器织布局、开平矿务局和电报总局。电报总局始设天津，后改上海，所以上海有其三，这些企业，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干设立起来的。在上海的广东人兴办了近代企业，只有他们才能打开局面，这是因为：第一，他们在洋行实习过，有办近代企业的经验，能破坏中国固有陋习，使用新的经营方法，把企业办好；第二，他们本身有资本；第三，他们凭藉同乡的关系，能联络上富有的在沪乃至在其他地方的广东商人到上海投资。

在上海经营对南洋华侨贸易的，主要是闽粤商人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甲午战争期间，广邦协泰和、潮邦花德盛，甲午战后，潮邦仁诚、谢璧记、春华等商号主要从事南洋华侨所需商品的交易。

广东人在沪经营工商业，特别是新式企业，对于当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、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积极意义：一是创办近代工商企业。在造船、航运、电报、纱布、造纸、保险等业，其中有旧行业，有过去所没有的新行业，但都有采用新式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的，破坏旧行业的管理办法。二是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。原来买办在洋行搭股，是买办资本，从中分化出来，开办民族工商企业，成为民族资本，扩大了民族资本队伍，对发展近代生产有利。三是保护中华利益，与外国经济势力进行商战。以航运业讲，轮船招商局设立以前，由美国上海轮船公司、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控制长江航运，所以法国人梅朋、傅立德在《上海法租界史》一书中说，轮船招商局的出现，“是令人瞩目的”。它与英、美轮船公司竞争，挽回部分航运权利，其主管人之一郑观应说它“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”，也不算过分。郑观应还说他自己先做买卖，后来搞民族企业，是“初则学商战于外人，继则与外人商战，欲挽利权以塞漏卮”，用外国人的办法与外国人竞争，争取中华民

族的权利。四是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则与新式企业建立的同时，出现新的生产关系，即民族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。五是影响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。新式企业出现必然影响思想界，提出适合于它生存、发展的要求，郑观应就成为改良思想家，提出工艺救国的主张：“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，工艺既兴，物产即因之饶裕。欲救中国之贫，莫如大兴工艺。”成为后来问世的工业救国论的先声。同时他主张政治改良，要求设议院。

总之，在沪粤人对于发展上海经济，尤其是建设近代企业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；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上海的近代企业和发达的经济。这种作用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江、浙籍人在沪势力没有超越粤人之时，更加显著。洋务运动以后，上海成为近代化趋势明显的城市，经济枢纽的作用与日俱增，促进全国的微弱的变化，同时粤人又是以上海为据点，四处经营工商业，所以他们对上海的作用，影响到全国。

三、粤人在上海的政治活动及其作用

广东人领头发动上海小刀会起义；维新运动中的上海，是康梁制造舆论的中心。在这清代后期上海两大政治事件中，广东人都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广东的移民把在广东流行的民间结社天地会带到上海，正是这一组织，作为基本力量发动了小刀会起义。这个团体的首领是刘丽川。刘是广东香山人，1845年参加天地会，1849年只身到沪，发展天地会成员，使之散布于上海及邻县青浦的城乡。1853年3月太平军到达南京后，上海民众谋图响应，刘丽川联合其他会党，并大度地以小刀会为联合团体的名称，于当年9月发动起义，给上海的历史留下了粤人的重重的一笔，光彩的一页。

戊戌变法是在北京进行的，舆论中心却在上海。不管在哪里，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广东人康有为、梁启超，而康梁在上海制造舆论的作用更大。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《万国公报》；次年1月上海《强学报》创刊，康有为令其弟子、广东人徐勤、何树龄主持笔政。北京、上海强学会先后被查封，浙江人汪康年办《时务报》，梁启超任主笔，康

门弟子粤人麦孟华、徐勤、欧矩甲先后来主笔政，番禺人黄延耀为该报理事，管理财务。黄遵宪为参预上海强学会活动，为《时务报》的出版筹款独多，贡献甚大。《时务报》自1896年8月9日创刊，至1898年8月8日止，共出版六十九册。刊出梁启超的《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》《变法通议》《西学书目表序例》，欧矩甲的《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》，徐勤的《中国除害议》等文，鼓吹变法。康梁在沪宣传变法维新思想，富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倡导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，主张废科举，清积弊，开议院以通下情，开办近代工商业。这些思想渗透到士大夫阶层，为变法制造了舆论，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。

康有为在沪组织学会，对民间政治团体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清朝历来不许士人成立政治组织，北京强学会的建立突破了这种限制，上海强学会的设立再次对限制政策加以冲击。北京强学会与上海强学会开创之举，打破了清朝严禁结社法令，以后民众组织社团已成不可遏制之势。事情还不只是在创立之功，更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具有近代民主色彩，是明清之际的稍具政治色彩的复社、几社和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所不能比拟的。爱国者建立团体，就为推翻清朝统治作了组织准备，所以强学会的建立有着深远意义。

仁人志士在沪集会、办报、译书，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，要求变法维新，在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的1897—1898年间，上海成为思想最活跃的地方，唱出变法的时代最强音，是宣传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。康有为到沪举办社团和报纸，他的学生梁、麦、徐、欧及弟弟康广仁、同乡黄遵宪、黄延耀等人的宣传组织活动，对上海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阵地起了倡导作用和推动作用。没有这批广东人的到来，上海难以成为维新舆论中心。

广东移民是19世纪后半叶的上海居民的重要构成部分；广东人在上海开办商店，经营转口贸易，建立近代式企业，对上海经济发展，对其成为对外贸易中心、航运中心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城市，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；广东人在近代上海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，起过促进社会变革的良好作用，广东人还在上海组织地域性、商业性团体，办理社会救济事业和公益事业，一定程度影响上海居民的社会生活。总之，作为移民

城市的上海，有了广东人的新血液，面貌发生很大变化，它的历史，具有了广东人的一些面貌；或者说，没有广东人的参与，清代后期的上海就不会是它那样的历史面貌。

（选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《中国史论集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，有删节）

编者补白：广东人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，鼎力塑造着上海的辉煌，同时也在成就自己。其实，我们也可以说，一部广东近现代史，假如没有上海（这个舞台），会是什么样，更可以说，一部中国近现代史，假如没有上海，会是什么样。上海与广东，也可以说长三角与珠三角良性互动的历史启示我们，中华文明的新的伟大复兴，正有赖于中华文明各个可以细分的区域文化的互动共融和新生。这也正是岭南文化在自觉其历史承担，不断引领对外开放，更要不断“北伐”促进对内开放的重要意义。